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夏芳, 戴运财

(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全球治理具有深远意义, 也是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国际认知的深度和认可的广度上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话语权由“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两个子概念构成。前者是话语具有的、能对话语对象产生影响力的能力; 后者是话语因被话语对象认可而产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要通过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来加强其话语赋权、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空间来提升其话语权威。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权; 话语赋权; 话语权威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3) 04-0060-09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 自然灾害、环境恶化、疫情流行、地区冲突、逆全球化思潮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凸显, 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唯有携手共进、勠力同心, 方能有效应对危机和挑战, 共筑美好未来。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发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呼吁加强国际合作, 摒弃冷战思维, 用新思想、新模式进行全球治理, 推动世界向好向善发展, 造福全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思想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倡导多元文明互鉴、共赢共享, 构建开放、包容、和谐的国际秩序, 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中国经历了近现代种种困难、曲折之后成功实现了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真正的奇迹”,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创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同舟共济”等和合文化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创新表达, 是中国当代发展经验的总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生存条件下, 中国取得的成就为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治愈国际秩序中的顽疾沉痾提供了中国方案, 为世界注入了信心和活力。

由于近现代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优势和强势地位, 形成了习惯性的自我优越感, 加之囿于冷战思维, 存在质疑和曲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现象, 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当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西方的接受度受到巨大挑战。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主张的努力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学术界已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权研究多侧重于国际关系和传播理论等视角, 以及关于传播媒介、传播策略、议程设置等方面的对策研究。随着人类命运共同

基金项目: 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机制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话语建构研究”(21DWHY12);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专项重点委托课题“华人华侨在中国戏曲国际共享中的贡献与作用——以越剧的海外传播为例”(23EZQK103)。

作者简介: 夏芳, 女, 副教授, 博士; 戴运财, 男, 教授, 博士。

体话语向世界纵深传播,提高国际认可度成为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关键。^[1]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志洲教授认为话语“只有被认同才会转化为话语权”^[2]。那么,如何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认可度,增强其国际话语权,从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本文拟从话语与权力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现状与建设路径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以供讨论。

二、权力话语与话语权力

(一) 权力话语

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由结构主义转向建构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建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话语构建社会意义的功能。语言和社会现实之间互为建构,即语言构建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反过来对语言使用产生影响。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而非具体语言文本的“话语”成为研究对象。语言不再仅仅被当作工具,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而是站在了中心位置。语言本身就是哲学,就是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我们用语言来表征意义、构建社会关系、形成自我认知。在此背景下,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实践”概念,强调语言不仅是信息媒介,更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的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中弥漫着权力的运作。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力量,它通过社会主体的话语实践和制造知识真理来形塑社会欲望、组织结构和社会等级。^[3]话语是实现权力的技术手段,话语本身也是权力。^[4]权力被话语构建,通过话语被实施,话语实践也即权力实践。

权力话语是福柯关于知识、权力、话语系列论著的核心,成为我们认知社会和构建知识的重要理论工具。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揭示人们如何在历史条件、社会关系、社会规则、社会价值、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的制约下使用语言,构建和改变了哪些社会现实,同时又受到了哪些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福柯说:“话语是一揽子流动于社会关系中的具有限制和被限制功能的意义。”^[5]话语的限制和被限制功能在某一特定话语场域中发挥其作用,通过调节话语方式、话题范围、思想价值,使特定的话语能被辨认出来,使其与其他话语场域区分开来。在此,话语不是具体的文本,而是一套隐匿的规则。这套规则决定了言语对象、概念、陈述方式及其表意功能,福柯称之为“话语秩序”。^{[4](49)}

话语秩序的规定性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通过排斥(exclusion)程序的禁律(prohibition)、划分(division)和拒绝(rejection)来设定说话人的权利、谈论的主题、环境、对象等,实现外部控制。同时划分理性与疯癫、真理与谬误,来形塑和维系制度化、规仪化的话语体系,排斥新的话语体系,控制话语的衍生,规避难以驾驭的话语。话语的制度、规仪是话语在长期反复实践中沉淀,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条件相关联,在历史中演变而成的结果。同时,福柯也指出话语秩序的控制功能也来自话语内部,通过文本以及围绕文本衍生、延续或评论的文本,比如法律文本、文学文本和各种学科分类的科学文本等,实现内部净化控制。这些文本不是绝对的和恒定不变的,而是被不断重复、评论、阐释的。它们在原文本基础上,在学科限定的范围之内构建新的话语,拒绝超越话语规则的话语进入该话语场,从而实现其学科文本的意义功能。这种限定和被限定就是话语的权力。福柯声称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他在对精神病院、医院和监狱的机构话语分析中发展了权力的概念。权力被物化在机构组织结构中,从而定义了不平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医院中的医生享有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权来自其拥有的专业知识赋予他们的治病能力,即“学科性(话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也来自医院机构给予他们资质,许可他们对病人行使特定的控制权。所以,权力与知识真理、机构组织紧密相连,以微观政治学的形式弥漫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物化了知识权力或者话语权力关系系统。

(二) 作为“赋权”与“权威”的话语权力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权力”得到深入研究。20世纪后半叶,许多理论家就权力的形式及

权力得以施展的基础和资源展开了讨论。^{[6][7]}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 (Denise Wrong) 认为用福柯所说的“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并不能准确说明权力的定义,因为权力不仅存在于冲突关系模型中,也存在于平等合作的关系模型中。他采用了当时许多理论家的做法:在思考和谈论权力时,根据所论权力的基础和资源来决定是“power to”(行动权)还是“power over”(控制权)^[8]。“行动权”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自身具有的,能作用于世界或者带来确定影响的能力。“控制权”是指在不对称社会权力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施加影响和掌控的权力。他强调在看待社会交往双方相互施加的影响和控制时,有必要对“行动权”和“控制权”二者加以区分。^{[8](28)}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把“power to”定义为“转变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或者说是“获得成效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achieve outcomes),是指行为者具有让行动对象遵从自己来实现自己意志的内在能力。^[9]它指向的是个人对外部施加影响、产生效果的意向和潜能。吉登斯认为权力与行为相关联,强调行为的效果。在他看来,权力意味着行为主体的选择自由,权力是将一切手段配置起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行为。就某一主体而言,权力指向主体的授权(empowerment)(与朗所定义的“行动权”相似)。主体具有的,使其行为产生能效的权力是主宰权(mastery)(类似朗的“控制权”)。尽管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及表述不尽相同,但是都同意权力有两种相对的形式:“power to”(行动权)和“power over”(控制权)。前者是指一种实施权力的能力,即“power as capacity”(作为能力的权力);后者是指实施控制的权力,即“power as domination”(作为控制的权力)。

从形式上,朗认为权力主体通过武力(force)、操纵(manipulation)和说服(persuasion)三种形式来实现“行动权”,通过权威(authority)来实现“控制权”。前三类是权力主体对他人产生影响和实现权力方意志的能力。就话语而言,是话语实现话语效果的可能性,是潜能,是话语的行动权(power to)。权威是权力主体因为权力对象认同权力主体的内容或来源,自愿遵从权力主体而实现的控制权(power over)。就话语来说,就是话语的权威,比如权力对象因为认可“说话人的身份、资源和个人品质”而愿意接受权力主体的话语。权力主体因被认可、被承认而能够实施权力,影响权力对象。这种无需武力、操纵和说服就能实现的控制效果就是“权威”的力量。^{[8](42)}朗把权威细分为五个子类:强制性权威(coercive authority)、诱导性权威(authority by inducement)、合法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合格权威(competent authority)和个人权威(personal authority)。^{[8](26-37)}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三个基本权威类型: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和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10]法理权威包含法律理性权威和学术理性权威。法律理性权威来源于权力对象对法律话语的认同;学术理性权威来源于权力对象对学术等组织机构话语的认同。传统权威来源于权力对象对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认同。魅力权威指权力主体因其个人超凡的品质对权力对象产生的吸引力,让权力对象认可他且自愿接受他。朗的分类强调了权力的政治性,韦伯的分类反映了权力的社会属性。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韦伯的三分类更加适合本话语研究。虽然上述思想家的权力论述有所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区分了权力的来源:一是内部的能力;二是外部的认可。为方便理解和阐述,下文将朗所说的话语“行动权”称为“话语赋权”(discursive power),将话语“控制权”称为“话语权威”(discursive authority)。

“话语赋权”是话语传递的知识信息产生期待效果的能力,来源于话语内部结构产生的说服力、合理性和操纵性。“话语权威”则建立在话语接收者的认可基础上。在话语接收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存在着约定俗成的一整套或者一系列规约,它规定了哪些人被认为可以享有话语特权,哪些话语能够被信任、可以被认可。这些规约是“法理权威”和“传统权威”的来源。此外,话语权威还来自话语接收者对话语者具有的独特品质的认可,因为认可话语者的个人品质所以认可他的话语,即“魅力权威”。区分“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有助于反思和构建话语权的路径。从社会话语实践互动中权力的两

个来源——话语生产者和话语接收者——的角度来思考话语的力量。话语权建设应相应包含“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来自话语内部结构产生的话语影响潜能,后者来自话语外部条件赋予话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第一要义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化。中国话语国际化是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一是中西方话语体系不同,打通中西方话语需要破解话语的自我保护机制;二是国际话语秩序中“西强东弱”格局持续,中国话语受到西方牵制,突破西方话语的藩篱是中国话语国际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 中西方话语融通程度不高,中国话语在西方遭遇“认知障碍”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包含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认知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和“天下为公”的治理观^[11],高度体现了中国综合性思维习惯的特点和高度概括的话语方式。其既是思想论也是方法论,是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承载着中国人对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追求。在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中,中国倡议彰显了中国担当,其蕴含的价值理念具有世界意义。但是由于中西方在各自文明进程中发展出不同的语言和话语方式,造成了中西方话语间理解的障碍。此外,社会、历史、政治等多种原因也造成了西方人理解中国,相对于中国人理解西方来说,显得更为困难。

语言不通是一大障碍。母语是人们认知世界、接受信息最直接、最主要的媒介工具。中国话语要国际化,语言翻译必不可少。语言是符号系统、文化系统和思维系统的综合体,高质量的翻译必须跨越这三个系统。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为例,在“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被广泛认可前,经历了“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等多种翻译尝试。即便是对现在的译文,还是有不少西方民众表示很难理解和接受。在他们看来,中国倡议是抽象的口号,是概念而不是明确的行动纲领。这种困惑源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习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综合性思维习惯的结果。在语言表达上,西方重视逻辑性和表意的直截了当;与之相反,中国表达讲究含蓄、委婉,擅长“微言大义”。此外,西方理解困难还源于中西方对世界认知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西方将个人自我置于认知世界的中心和起点位置,遵循个人利益先于集体利益的价值观传统;崇尚竞争文化,认为竞争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前进的动力。这些都是造成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和合思想和“天下观”的原因。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西方遭遇了“认知困难”。“认知困难”还表现在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产品的理解和接受上。中国思想和价值浸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产品中。我国文化艺术产品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话语国际化的需要,如文学、书法、绘画和影视作品等,都有待得到高水平的转译和传播。

现阶段,中国要积极主动地增强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联系和连接,通过语言转换等方式使中国话语具有西方可理解性,把中国话语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转化成西方可理解和可接受的话语形式。话语转换涉及语言符号转换和话语功能对等,需要围绕功能对等展开一系列本土化运作。西方在文化产品国际化和本土化上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而我国推进中国文化产品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机制,人才缺乏,产品本土化质量和体量都不足。如何找到中西方价值通性,将中国思想化解成西方可理解、可接受的文化产品形式,为世界人民提供知华、懂华的话语产品,帮助他们清除“认知障碍”,是中国话语国际化面对的重要挑战。

(二) 西方话语长期主导国际话语场,中国话语在西方遭遇“舆论打压”

当前的国际秩序总体延续了二战后美国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联盟。^[12]西方国家依靠制造自由主义民

主、资本主义、安全合作、法律规则、人权等话语保证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持久性和影响力，形成了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世界话语，在诸多领域构建起以西方话语规则为标准的话语体系。西方国家利用其国际话语优势，在人权、经济、科技、国家治理等许多领域对中国发难，用“修昔底德陷阱”所表达的“国强必霸”的逻辑来想象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话语，抹黑中国形象。其坚持认为西方竞争文化和零和思维的普遍正当性，拒绝接受中国的和合思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歪曲为中国阴谋——在全球推行中国文化，从而在经济上为本国谋取资源、在政治上推广“集权”政治——以此诱导国际民众消极理解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13][14]}在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新闻生产和流通的既有优势，操纵舆论机器，设置反华议题攻击中国，将中国话语绞杀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为此，我国不得不进行大量反复的自证清白的工作。但是“命题作文”式话语实践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国际话语场上所处的被动局面。相反，还可能让我国始终受制于西方话语的牵制，无法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逻辑，系统地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范式。这是造成中国在国际话语中被动“陈情”“说理”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西方抵制中国话语的本质是维护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维护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价值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和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上都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但是我国在“融通中外”研究上进展缓慢，人类话语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中国思想理念表述阶段，没有形成含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在内的完整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说服力不强，很难与国际学界开展学术对话交流。没有交流对话，就无法凝聚国际社会法理共识、价值共识和学术共识，就无法打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何创新中国话语，打造中国话语的国际范式，增强科学理性和说服力是中国话语国际化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路径

上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话语权力来源看，可以归结为“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两个方面。如前文所论，“话语赋权”是话语具有的产生改变效果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来自话语主体生产的话语，权力生成方是话语生产者。“话语权威”是话语因为外部条件产生的影响力，基本表征为话语因为话语接收方对话语或/和话语生产者的认可而产生的影响力。权力生成方是话语接收者。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应从“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两个维度进行。

（一）话语赋权建设：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消除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认知障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汲取了千年历史经验和历久弥新的中国智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不同于其他的文明经验，它是在人类最朴实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共享同一时空的生存条件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和谐一体的整体认知观。求同存异、多元共生的伦理观，平等合作、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是人类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满足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要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发挥中国力量。在国际传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国际化的表达，就是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内在影响力，要为中国话语“赋权”。中国“话语赋权”建设主要包括求同存异的价值观话语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本地化生产，二者互为表里。

在价值观上，要生产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拆解西方话语自我保护的藩篱，帮助西方社会跳出传统思想的窠臼，以人类发展历史为关照，以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高度和胸怀，来了解中国文化，认知中国。

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通过话语实践传达到世界各地。在西方话语场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新话语。新话语的出现会激活现有主体话语的排异自我保护机制。福柯指出,新话语可以采取反向原则(a principle of reversal),找到原初经验(originating experience)来对抗现实话语秩序。^[4]要让外国人理解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让话语尽可能回归价值概念的源头和形成的过程,帮助他们找到共同的经验。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思是地域不同、说法不同,但文化相通、本质相同。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包括重视集体利益和保护个体利益的利益观。这种价值观在不同国家民族可能表达方式或者侧重程度不同,但重视家庭、社区等的集体利益,认同尊老爱幼的道德观是相通的。中国话语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些概念在国际传播中要顺应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可以通过从当地话语中找到并借用最能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体概念的术语,向当地人民阐述中国思想,提高他们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是西方社会传统的核心关切,我们可以将中国话语切入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话语之中,展开对话交流,用中国共同富裕的故事,阐释和例证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展”等价值思想的中国性和世界性。

文化产品是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物化表现形式。文化产品本地化是文化产品生产者对产品目的国家的市场文化进行深入调研,采取顶层设计的方式,针对目的国家市场接受特点进行创作和再创作,确保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融入目的国文化,实现产品为目的国家市场接受和认可的方法策略。可口可乐公司在菲律宾制作名为“东方之珠”的可口可乐饮料广告,1997年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全球热播都是本土化策略的成功案例。本土化运作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产品本土化的成功经验。全球化、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形态加速迭代转型,中国故事的国际讲述方式持续面临挑战,如何守正、创新中国话语直接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效果。受个体主义文化影响,西方人习惯从个体的角度来认知世界,倾向接受“小”叙事。为提高西方社会的接受度和效果,我们可以把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具象到个体生命叙事中。不论种族、地区、文化差异,人们都对美食、美景、自然生态、和睦的家庭、互助的乡邻社区有着同样的理解和追求。这些相通的生命、生活体验可以通过个体生命的“小”叙事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传记是人类最普遍、历史最悠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外都有着悠久的传记传统,记录个体生命和生活历程是人类共同的趣旨。中国是传记大国,人物传记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人物传记、传记外译和影视创作等艺术形式让国外受众走进中国人的人生,透过真实具体的中国人个体的故事,感悟其中蕴含着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核,由此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和理解。

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共同价值被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理解,需要通晓中外文化、精通中外不同语言表达和话语规则的国际沟通人才,根据传播对象国家的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产品采取灵活的语言和文化转译策略,生产国际化的中国话语,增强中国话语改变世界的能力。为此,我们要加强区域别研究,针对不同国家全方位打造国际沟通人才,传播中国知识,通过“话语赋权”建设,帮助国际社会消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认知障碍。

(二) 话语权威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认同空间,打破西方的话语围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赋权”建设是以内容为导向的权力建设。话语权的另一个建设维度是“话语权威”建设,是以外部认可为导向的权力建设。对照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法理权威(包含法律理性权威和学术理性权威)、传统权威和魅力权威,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权威可以利用国际平台,参与国际治理,构建法律理性权威;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交流,构建学术理性权威;凝聚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获得传统权威;塑造良好中国形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赢得魅力权威。通过塑

造“权威”，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打破在国际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围堵。

第一，广泛参与国际治理，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合法性，构建法律理性权威。联合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组织，是解决超越国界问题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中国可以通过广泛参与联合国议题的设置、国际规则和国际政策的制定，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更多的联合国决议中，在化解全球治理难题中贡献中国智慧，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共识的达成，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比如充分发挥中国作为 ISO 成员国的职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为具体行业中实现国际合作、互利共赢提供法律理性权威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原发性创新力度，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中国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水平。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案例，国际认可程度在不断提高。中国要顺势而为，加大“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宣传，用不可辩驳的数据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跨越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政体、不同意识形态的藩篱，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证明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引领世界向着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用“一带一路”受惠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对安全、发展、民主、平等、多元的价值追求，彰显其合法性。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共同体，夯实学术理性权威。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蕴含着深邃的中国哲理，但是只有被西方社会理解和认可，才能具有话语权威。一是，中国之所以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为其原理生发于中国特有的、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扎根在不同文化、民族、种族、社会形态不断融合的沃土中，是中国独有的智慧，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其超越时空的意义通性需要全世界各国学者汇集到一起，持续关注、研究和传播，衍生文本与原始文本聚集在一起，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学科话语”，生成“学科性（话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通性意义还表现在它对人类实践的多领域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需要不同学科学者共同参与跨学科研究，对它进行系统阐发，把它变成国际学术话语。用福柯的话说，新的学科性话语权是在被不断重复、评论、阐释，在原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方式需要变通成其他国家人民易懂、好理解的话语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立在中国认知基础上，从中国知识体系中发展而来，但当今世界知识架构建立在西方认知基础上，是在描述西方社会、解决西方社会问题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涵盖了整个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特质：工业、产业、资本、个人主义等。要让西方社会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的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实践需要跨越中西方不同认知模式带来的沟通障碍，找到避免触发或消解西方知识话语秩序自我保护的排斥机制的话语方式来阐释，通过融通中外的研究不断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思路，把研究推向新高度。比如，由中外学者编著的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cept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2021 年在荷兰和美国出版，向西方读者阐释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成就：贫困消除、可持续性发展、妇女权益保护等。中外学者围绕人权这个西方社会重点关切的问题，按照西方学术话语方式生产、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话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树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理性权威。

第三，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传播人类共同价值，彰显美美与共的中国思想，赢得传统价值权威。不同国家虽然文化传统不同，但是对人类最基本的善恶美丑的定义是相同的。同情弱者、关爱他人、尊重他人、诚实守信、热爱生活、爱护家庭等，这些品质构成人类对美好的共同定义。通过分享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激活不同国家人们共通的原初生活经验感受，形成价值认同共同体，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从人类共同价值传统中获取权威。如何传播共同价值呢？《老子》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语言是人类思想表达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但也有局限性。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为跨越语言障

碍、提供共同体验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构建价值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传播需要尽量克服语言不通带来的不便,要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实现意义传播。云南“野象北移”的报道和李子柒网络视频就是基于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利用媒体手段获得话语权威的成功案例。

李子柒在她的视频中言语极少,默默地用四季的劳作来呈现一个普通中国人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展示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她的视频满足了世界现代都市人对自然的向往,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共同想象,反映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相同的理解。视频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2021年6月间,云南亚洲大象北移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BBC、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和《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世界的镜头都汇集到这群在中国大地上自由行走的野象身上。透过西方媒体的镜头,国际社会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山水、中国人民、中国发展、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和宁静。所有报道都是正面和积极的,这在习惯用偏见报道中国的国际舆论场上是难得一见的现象。通过这些影像和文字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承载的人类共同价值得到了最直观的反映,实现了不辩而胜的传播效果,有效地提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权威性。这些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对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统权威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第四,多方位、多形式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成就,增强魅力权威。中西方都认可“魅力”的影响力,英语中有“love me, love my dog”的谚语,中国有“爱屋及乌”的成语,都是说明魅力的作用。中国《礼记·学记》说:“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之道,也是人类之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成就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魅力权威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援助、国际交流等硕果累累,在国际关系层面很好地传播了积极的中国形象。^[15]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还需要重视和增强世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感知。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故事是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声音是中国人的声音,要全面、真实、立体地展示中国和中国人的魅力。构建中国话语魅力权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其一,展示中国自信,使之感染世界,让世界为之共鸣,提高形象魅力指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自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也是中国世界担当的能力表现。百年变局,中国必将站在世界舞台中央,这种自信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了的自信。我们要向世界展示我们对自己发展道路的自信、对自己发展理论的自信、对自己国家制度的自信 and 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我们要自信地向世界讲述我们国家发展的坎坷之路,讲述我们的政党和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福祉献出生命和鲜血的烈士、勇士和各行各业仁人志士,讲述我们奋斗得来的伟大成就,展示我们丰富的个人文化和精神生活,展示我国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生活,让中国励精图治擘画的美好未来感染全世界。

其二,融通中外话语方式,提升话语沟通能力,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接受性和认可度。在国际外交领域,中国要广泛参与国际话题,因势利导地设置中国议题。在行业沟通中要善于倾听、欣赏、分享知识信息,学习不同的话语方式,提高沟通效果。在国际学术领域,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友好的国际社会名流、学术专家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研讨、阐发。在大众传播领域,鼓励青年利用大众社交媒体生产数字化的中国话语,创新传播方式,展示美丽中国,构建世界青年共同价值体,形成世界青年话语共同体。鼓励各个层面多种形式的中外人文交流,“走出去”“迎进来”,发挥民间文化交流的作用,展现中国魅力的机理和纹理,增强中国的亲和度,让世界理解和认可中国的思想理念。

其三,加强中国原发创造力,让世界感受中国智慧的力量,增强吸引力。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是能直面挑战的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方向,能激励他国,为世界注入信心,并带来积极的改变。创造力体现在思维创新、科技创新、文艺创新等方面,要让世界看到中国创造不仅能满足中国发展需求、满足中国人的需要,更能引领世界科技前沿,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让世界为之折服,形成中国“磁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五、结 语

本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讨论了国际话语权的概念界定,提出依据权力来源和实施基础,话语权应包含“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两个权力子概念,分别是话语自身具有的影响力和话语被认可而产生的影响力。从“话语赋权”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国际化生产水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具体概念和文化产品进行本土化运作,创新概念、范畴和表达,帮助国际社会提高对中国的认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从“话语权威”角度出发,我们要从中国自信、中国公共外交和大众社交、中国创新等方面展现中国魅力。通过“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的“双向奔赴”,才能更好地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话语权。本文希望能通过区分“话语赋权”和“话语权威”两个概念,为加强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中国话语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金天栋,任晓.“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共通的意义空间”研究[J].社会科学,2021(2):32-46.
- [2] 张志洲.从国际话语权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24-33.
- [3] Foucault, M. (1980). Truth and Power. In Gordon, C. (eds.).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ichel Foucault, 1972-1977*. New York: The Harvester Press, 109-133.
- [4] Foucault, M. (1981).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Robert, Y. (eds.).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48-78.
- [5] 朱振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J].现代传播,2018(9):32-37+55.
- [6] Wartenberg, T. E. (1990). *The forms of power: From domination to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niversity Press.
- [7] Wrong, D. H. (1997).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8]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4.
- [9]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0] Weber, M.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11] 王义桅.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16-26.
- [12] Ikenberry, G. & John, A. (2018). New order of things?: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over world order. In Asle, T. (eds.). *Will China's rise be peaceful?: The rise of a great power in theor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36.
- [13] 王淼,王鹏.海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21(1):156-163.
- [14] 罗云,胡尉尉,严双伍.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评介[J].社会主义研究,2020(1):154-160.
- [15] Hartig, F. (2019).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4 (1): 68-81.